

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政策演变、现实动力与对策建议

□郭文富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的关系由相对独立、沟通衔接正在走向统筹协调。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结构变化、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等对统筹“三教”发展提出新要求,但“三教”协调发展与协同创新仍面临观念阻碍与制度障碍等问题,需要健全统筹管理体系、优化协调运行机制并改革关键环节。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

作者简介:郭文富(1986—),男,山东临沂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发展理论、政策与评价。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重点委托课题“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研究”(编号:2021ZDWT06),主持人:马树超。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23)06-0039-07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这是新时代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用系统化思维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战略举措,对于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服务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目前关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以下简称“三教”)关系的学术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有代表性的观点,比如张力(2023)认为,统筹“三教”协同创新,对开拓“三教”可持续发展新局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意义^[1];马树超等(2023)认为,“三教”正在探索一条中国式统筹协调发展之路^[2];张晨等(2022)认为,“规模”和“经费”是“协调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两个结构性指标^[3]。统筹“三教”协调发展与协同创新,需要更好地认识“三教”关系的历史脉络、现实动力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统筹“三教”发展的政策演变脉络

新中国成立以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大

众受教育的需求,在政府宏观政策引导下,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三教”之间的关系不断升级、内涵不断丰富,大体呈现出相对独立、沟通衔接再到统筹协调的三个阶段特征。

(一)“三教”偏重相对独立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现的是“从无到有”的跨越,三者发展更多侧重的是各自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各自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三者之间的关系偏重于相对独立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业待兴和广大劳动人民提高文化水平的需要,1951年《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包括专科学校)要为国家培养具有高级专门知识的建设人才,中等专业学校按照国家建设需要实施各类中等专业教育等,并要求各级政府设立各级各类补习学校和函授学校。1985年,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使职业技术教育得到广泛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潜力和活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并举,同时强调有关干部、职工、农民的成人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是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1995年,《教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进一步明确了“三教”的法律地位。在“相对独立”发展阶段,我国大体处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职业教育弥补了高考“独木桥”的瓶颈难题,成人教育承担了补充学历教育的重要作用,三类教育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三者快速发展为“三教”关系的进一步演变和深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三教”强调相互沟通衔接阶段

20世纪末以来,面对经济高速增长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的迫切要求,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受教育需求,“三教”进入沟通衔接发展新阶段。三者逐步加强相互间的链接,初步建构了“三教”互相联通的体系框架。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教育内在规律相适应、不同类型教育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教育体制,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要创造条件实行弹性的学习制度,放宽招生和入学的年龄限制,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和其他继续教育。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相互衔接、相互沟通的教育体系。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明确,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并提出组织开展终身教育体制机制建设试点,建立区域内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的沟通机制。2012年《国家教育事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进一步要求,促进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搭建通过各种学习途径成才的“立交桥”。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则要求统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继续教育发展,并提出了涵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教育体系基本框架。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进而提出,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历教

育与非学历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沟通衔接的机制。在“沟通衔接”阶段,高等教育通过扩招实现规模快速扩大,2002年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老百姓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进一步激发,三类教育的社会认同度出现分化,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价值认同下降,高等教育的龙头地位逐步显现。国家系列政策促进了三者的沟通衔接,统筹“三教”发展从要素层面进一步上升到体系层面。

(三)“三教”促进统筹协调发展阶段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新时代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进入体系化发展新阶段,更加强调“三教”统筹协调发展和协同创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要求完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强化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服务功能,开展多类型多形式的职工继续教育。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要推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要求健全职业学校评价,推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探索开展高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情况评价,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2022年,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有序有效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在“统筹协调”阶段,2019年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引领作用更加彰显。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对国家战略人才、学习型社会、技能型社会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统筹“三

教”协调发展和协同创新的任务更加迫切。

70多年来,“三教”发展筚路蓝缕、起起伏伏,从“一穷二白”到“世界最大规模”,从“规模发展”转向“质量发展”,从“单兵突进”转向“统筹协调”,并且强调“协同创新”,正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教”统筹之路。“三教”是由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三教”关系的政策演变体现了子系统自身及其相互间关系流的变化,反映了“三教”关系的具体内涵与价值取向。从教育体系的视角来看,“三教”从“相对独立”到“沟通衔接”再转向“统筹协调”,三个阶段的演变契合了高等教育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进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主导作用。从内涵价值的视角来看,“三教”统筹发展不仅包含规模结构的协调,还包括各类教育的功能分工以及相互间的沟通衔接、机制建设和价值认同等。“三教”间的关系不断深化,这既是“三教”自身持续探索的自然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外化表现。新时期,协同创新成为“三教”统筹发展的最新要求和目标指向。

二、新时期统筹“三教”协同创新的现实动力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动“三教”统筹协同创新,既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需要。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统筹“三教”协同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成为统筹“三教”发展的动力之源。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三教”统筹协同提升人才供给能级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4]。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较早提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强调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可以通过直接增加劳动力、提高劳动力操作水平、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助力经济发展^[5],可以说,没有人的发展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价值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作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重大决策,推动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之路^[6]。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传统产业逐渐转向依靠新技术、新产品的现代产业,以2020年为例,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逆势成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7.1%、6.6%、8.3%,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17.3%、29.6%^[7]。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技术技能升级。但有调研显示,我国高技能人才占比较低,企业技能劳动者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求人倍率达到2以上^[8]。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从注重人才数量、规模转向更加注重人才质量、效能,“三教”统筹协调发展是高质量人才供给的基本前提。

(二)人口结构变化要求“三教”统筹协同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给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绩,有研究表明,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是以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等为主要表现的人口红利^[9,10]。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即15—64岁人口)总量在2015年达到峰值,为10.10亿人,至2020年下降为9.69亿人,大体相当于2008年的总量;65岁以上人口呈明显上升趋势,2020年总量达到1.91亿人,相比2008年增长了74%,老年抚养比达到19.7%,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11]。与此同时,未来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重点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对一定数量和更高质量产业工人的需求是持续的。积极应对新的人口结构变化,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提高人力资本,一是提升人力资源质量,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二是积极应对老龄化,学会与老龄化共舞^[12]。在此过程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舒尔茨认为,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5]。面对传统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正在加快消失的现实情况,如

何统筹协调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形成一个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三教”领域涵盖了学校教育的终端和在职培训的全段,覆盖了劳动年龄人口和老龄人口,打通“三教”之间的壁垒,推动“三教”统筹协调创新,正是打造终身学习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战略举措。

(三) 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要求深化“三教”统筹协调内部改革

建设教育强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建设教育强国要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12]。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至2020年,我国普通高校2738所,其中,本科院校1270所、高职院校1468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13],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普通本科招生占整个高等教育招生的28.69%,高职教育招生占整个高等教育招生的32.42%,各种形式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包括成人、开放、自考获得学历的)占整个高等教育招生的38.98%,全国涉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学校数达到1891所^[14]。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学校2.45万所,其中,中等职业学校9896所,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2%。类型多样、层次多元、规模庞大的“三教”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高质量教育体系体现了系统的理念,这就要求进一步把教育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能画地为牢、各自为政、自我封闭,教育系统各阶段、各方面、各环节需要更加有机地衔接和整体设计、统筹协调^[15]。尤其是伴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提高,传统生源数量变化和非传统生源涌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三教”的格局性变化。与此同时,国家现代化将推动劳动力市场从普通劳动力为主转化为专业性劳动力为主^[16],这将对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因此从系统化、体系化的思维角度去看未来的教育改革,其重要的聚集点和关键环节就是推动“三教”统筹协调发展和协同创新,这是推动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教育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潜能的重要手段。

三、统筹“三教”协同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对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出系列挑战,我国经济升级、人口变化与教育变革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推动“三教”统筹协调发展、协同创新的政策号令已经发出,但反观现实实践,统筹“三教”协同创新仍然面临一些瓶颈难题,亟待重视与解决。

(一) 价值理念上存在观念阻碍与制度障碍

热爱教育、关心教育、愿意接受更多的教育,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基于此,长期以来,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高低之分、层次之别。该现象和问题既受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发展阶段性的表现,无关对错,但这种价值理念影响了“三教”统筹协调发展。职业教育缺乏吸引力,不受社会认可,教育系统内部关于职业教育是“二流教育”“次等教育”等观念严重,继续教育不受重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别沿着学术和职业的轨道独立运行,存在制度隔离与边界鸿沟问题^[17]。应充分认识到,若一国仅靠全面普及普通教育(即使普及普通高等教育),却没有适应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的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则很难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8]。统筹“三教”协同创新面临深层次的观念阻碍和制度障碍,面临多元主体利益分配问题,亟待在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中,加大改革创新深度和力度,完善“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尤其是基于传统文化影响和教育体系现状,当前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引领的“三教”协同创新机制。

(二) 体制机制上存在阶段困境与结构矛盾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统筹协调发展和协同创新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三教”之间从相对独立、沟通衔接再到统筹协调的三个阶段是基于发展事实的逻辑想象和经验判断,符号象征意义大于现实实践意义,实际上三个阶段并不是完全的前后递进关系,而是一些相对灵活的区间,三个阶段可以交叉并进、共同存在,后期阶段的到来并不会完全取代前期阶段,但如果没有前两个阶段的充分发展,

就没有办法完全实现第三阶段的愿景目标。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过渡中,“三教”之间所发生的质的变化更值得关注。目前,第一阶段存在短板,比如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类型教育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标准体系有待明确和落地;继续教育发展失范,质量参差不齐。第二阶段存在瓶颈,比如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体系沟通不畅,继续教育体系游离在外,产业界与教育界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不相适应等,对统筹“三教”协同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关键环节上缺乏标准体系与操作路径

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涉及到政府、学校、学生、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推进过程中要注重把握核心节点,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而招生入口、培养过程、毕业出口三大关键点的统筹协调就是这一系统工程的核心抓手。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统筹“三教”协同创新的实然应对仍然存在诸多瓶颈问题有待解决,“三教”沟通衔接存在等级标准模糊、融通机制与要素沟通不明等问题^[9],在“入口关”分类考试招生制度尚不完善,规模、结构、层次布局有待优化;在“培养关”高校分类发展路径不清晰,培养标准体系不健全、不兼容、不等值,产教深度融合体系尚未形成;在“出口关”缺乏互认、转化平台,国家资历框架尚未形成;在“保障关”各类教育资源配置与其功能定位尚不匹配等。

四、未来统筹“三教”协同创新的若干建议

一般系统结构理论认为,复杂系统行为是由复杂系统的信息流、物流、能量流、资金流、人力资源流等关系流共同决定和支配的^[20]。参照该理论,促进“三教”复杂系统统筹协调协同创新应重点关注其关系流的确定、变化及发展,那么首先应该明确“三教”的结构关系,厘清目标明确、结构合理的关系流;其次是理顺运行机制,形成适应需求、持续优化的关系流;第三是抓住核心要素,建构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关系流。

(一)健全统筹管理体系

统筹“三教”协同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

要在价值理念上树立一体化和体系化思维,健全统筹管理体系,推动“三教”从竞争性思维转向合作性思维,从自身“小逻辑”转向服从发展“大逻辑”,构建服务终身学习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三教”之间的关系进入统筹协调发展阶段时,“三教”的教育理念、功能定位、课程教学、管理模式等应该出现新的变化,应该转向整体发展观,从体制机制、结构类型、评价导向、发展保障等方面进行流程再造和机制塑造。首先,明确“三教”各自功能定位,推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能够充分且有效地发挥各自功能。全面研究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以及新教育形态等不同学段、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形态的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等^[21]。促进“三教”规模结构协调,尤其是普通本科与高职、普通本科与职业本科、专科高职与职业本科及其与继续教育之间的协调。其次,创新构建分类发展体系,比如,可以在研究型、应用型 and 职业技能型的高校分类体系框架下,构建区域普通高校分类发展和分类管理体系^[17]。加强资源配置改革,建立健全与分类发展体系相匹配的资源保障体系,推动各类教育各安其位、百舸争流、百花齐放。最后,站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高度,明确新时代“三教”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突出“融通”,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体现“全纳”,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强调“并重”,在此基础上,打造服务终身学习体系的教育共同体。

(二)优化协调运行机制

当前,“三教”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正在由相对独立、沟通衔接走向统筹协调发展阶段,统筹“三教”协同创新机制建设更加紧迫,其重点应该是立足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的目标,有效激发并发挥高等教育的主导作用,建强三大体系、扩展沟通途径、建立协调机制,通过补第一阶段(相对独立阶段)的短板、解第二阶段(沟通衔接阶段)的症结,推动实现第三阶段的统筹协调发展。首先,完善自我发展机制,重在由“三教”各自主管部门推进实施,形成高质量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高等教育既要在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也要服务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的多样化需求。职业教育要优化类型定位,推动建设适应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需要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继续教育要明确办学定位,解决无序扩招,推动规范办学,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健全沟通衔接机制,重在形成跨部门沟通途径,形成“三教”相互衔接沟通的框架体系。比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要超越部门主义、本位主义,建立双向互认、纵向流动的立交桥;职业教育要落实“职业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把开展产业工人的技能培训作为业务范围,让职业培训成为职业院校的主业。最后,构建互补互融机制,重在通过“大部制”协调推进,形成“三教”相互支撑、不可割裂的有机体系。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单兵突进式”改革,往往是向自身利益倾斜,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超脱部门利益的改革协调机构^[22]。

(三)聚焦改革关键环节

“三教”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为推进“三教”统筹协调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还要更好地“突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23],更好地体现“强烈的问题导向和鲜明的实践特色”,聚焦关键环节、核心问题,形成高等教育主导的统筹“三教”协同创新动力机制。首先,入口上完善招生考试制度,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完善省级统筹、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职教高考”制度,改善学生通过普通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问题,缓解家长对学生“出路”问题的焦虑。其次,培养过程中加强标准体系建设,“三教”统筹协调的核心内涵在于课程、教学与师资,其中相互认可的标准体系建设是根本,这也是推动“三教”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同时,要深化产教融合,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改革试点,形成目标导向、绩效导向、结果导向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完善多元主体利益分配,推动院校充分重视行业企业利益。最后,出口上构建国家资历框架,实现学习者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不同系统之间的学分转换。比如,欧洲理事会出台《欧洲资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EQF),形成横向上知识、技能、责任与

自主性层级因素与纵向上基础教育至博士或同等学历教育层级因素相互贯通的资格体系^[19]。聚焦等值性的资历框架可搭建“三教”之间相互认可的桥梁,能够有效打破制度割裂的状态,是推动“三教”统筹协调发展和协同创新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 [1]张力.开拓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新局面[N].中国教育报,2023-01-31(3).
- [2]马树超,郭文富.走中国特色“三教”统筹协调发展之路[J].中国高教研究,2023(1):8-13.
- [3]张晨,马树超,杨琳.谈新《职教法》“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22(6):97-102.
- [4]习近平.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N].人民日报,2021-09-29(1).
- [5]陈耀.高质量发展把对人才的要求推向新高度[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6):32-35.
- [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7]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1-2-28)[2023-02-25].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 [8]孙锐,孙彦玲.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工作体系:问题与对策[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2(2):3-16.
- [9]刘鹤.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R]//吴敬琏,等.中国经济 50 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263-277.
- [10]蔡昉.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J].国际经济评论,2020(2):9-24+4.
- [1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1: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EB/OL].(2021-09-01)[2023-03-0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1/indexch.htm>.
- [12]习近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1).
- [13]教育部.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

- OL]. (2021-08-27) [2023-02-25].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108/t20210827_555004.html.
- [14] 林宇. 高等继续教育改革发展的体会和思考[J]. 在线学习, 2021(11): 29-31.
- [15] 管培俊.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教育强国的奠基工程[J]. 教育研究, 2021, 42(3): 12-15.
- [16] 朱旭东, 刘丽莎. 论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高质量教育体系[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1, 42(1): 33-39.
- [17] 杨启光. 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如何更协调[N]. 光明日报, 2022-03-22(15).
- [18] 张力. 完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N]. 中国教育报, 2020-01-16(3).
- [19] 刘宝存, 张金明. 国际视野下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内涵、挑战及建设路径[J]. 重庆高教研究, 2022, 10(1): 6-14.
- [20] 林福永, 孙凯. 复杂网络关系流与行为关系定理: 一般系统结构理论在复杂网络中的应用[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7(9): 136-141.
- [21] 吴岩. 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N]. 中国教育报, 2020-12-08(1).
- [22] 南方日报评论员. 完善体制改革的统筹协调机制[N]. 南方日报, 2013-02-19(2).
- [23]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 人民日报, 2019-11-06(4).

责任编辑 肖称萍

Coordina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Policy Evolution, Realistic Motivation, and Problem Suggestions

Guo Wenfu

(Shanghai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has been moving towards coordination from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communication and link-up. The curren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nges i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kinds of education. Howeve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them still face problems such as conceptual barriers an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It needs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system, optimize the coordin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reform key links.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